

编者按：自从 2009 年乌鲁木齐市发生“7·5 事件”后，不仅新疆的民族关系明显恶化，全国各地政府和民众对待新疆人和维吾尔族的态度也出现很大变化。特别是 2013 年 10 月 28 日“金水桥事件”和 2014 年 3 月 1 日昆明火车站恶性事件发生后，许多城市的政府和公安部门从“维稳”的角度出发对各地的维吾尔族居民和流动人口表现出某种排斥和歧视的态度。

暴力恐怖分子残害无辜民众，触犯国家法律，理应受到法律严惩。但是，这些暴力恐怖分子毕竟只是一千万维吾尔族人当中的极少数，他们败坏了维吾尔族的声誉，完全不能代表维吾尔族民众。如果因为他们的残忍暴力恐怖活动就把维吾尔族整体打入“另册”，那恰恰是遂了这些暴恐分子的心愿。任何民族都可能出现极少数的犯罪分子，厦门公交车纵火事件和杭州公交车纵火事件的肇事者是汉族，也造成惨痛的生命损失，我们也不应因此对汉族“污名化”。

新疆远在西北边陲，维吾尔族在语言和宗教信仰方面与内地民众确实存在很大差异，文化和习俗差异很容易造成族群之间感情的隔膜，此时最需要的，就是敞开心扉，不带任何偏见地去了解和认识对方。自 1997 年以来我多次在新疆各地进行调查，结识许多维吾尔族朋友，有些是教师和学生，有些是市民和农民，他们都是纯朴、善良的普通人，有时也发些牢骚，他们与我在其他地方遇到的汉族和其他民族成员没有什么不同。同时，也正是由于语言与文化差异，他们在参与西部大开发的进程中遇到比汉族更多的障碍和瓶颈，也更需要得到政府和全社会的帮助和理解。中华民族有 56 个成员，大家都是这个民族大家庭中的平等一员，都有权利得到平等待遇和热情接纳。中华民族发展到今天，已经进入一损俱损、荣辱与共的历史时期。如何让各少数民族成员感受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且应当落实到我们每天的待人接物之中。

本期《通讯》从库尔班江编写的《我从新疆来》百篇自述中选出了 26 篇介绍给大家，这些自述生动质朴，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些自述和照片，更加切实地感受到来自新疆或把新疆作为自己故乡的人们的朴实、真诚和奋斗。我曾出席了《我从新疆来》在人民大会堂的发布会和北京大学的校园活动，最能打动我的，就是库尔班江说的这句话：“我是中国人”。我们也许语言不同，习俗不同，但是只要有了这句话，就够了。我们都是心心相连的兄弟姐妹！（马戎）

【文 章】

我这三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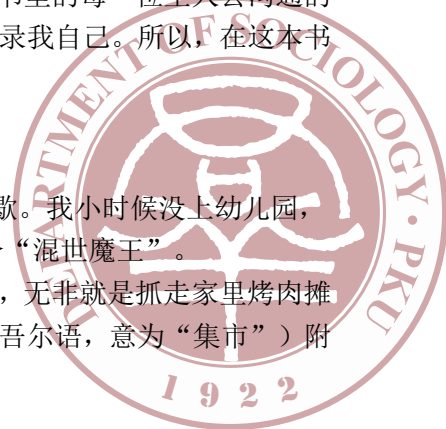
库尔班江·赛买提

我叫库尔班江·赛买提。20 世纪 80 年代初，我出生在新疆和田的一个维吾尔族家庭。时隔 30 年后的 2014 年，《凤凰周刊》的一位记者张弛写了一篇名为《一个维吾尔人的家庭史——库尔班江一家的开放年代》的文章，以我口述的方式讲述了我家这些年的经历。而在这本《我从新疆来》里，我也只是一个起点、一个线索，类似主持人吧，因为我和书里的每一位主人公沟通的时候，从他们的身上都看到了我自己的故事。我记录他们，也是在记录我自己。所以，在这本书的最前面，我想先给大家讲讲我的个人经历。

“混世魔王”

我妈说我出生时是个 10 斤重的胖小子，抱着我走一会儿就得歇歇。我小时候没上幼儿园，是我妈一手把我养大，另一手把我打大的，因为我小时候着实就是个“混世魔王”。

其实直到小学二年级我学习都挺好的，尊老爱幼，调皮程度可控，无非就是抓走家里烤肉摊前客人手里的烤肉，然后拿去给邻居家的小女孩。我家住在巴扎（维吾尔语，意为“集市”）附



近，我经常从巴扎的一头走到另一头，看见卖冰棍、瓜子、凉粉、羊杂碎的阿姨，我都叫“Apa”（维吾尔语，意为“妈妈”），然后帮她们卖一会儿，Apa 们都会给我点儿好吃的。我妈拿我没辙，我的 Apa 们都很喜欢我。后来我离开和田，Apa 们碰见我妈还会问我的近况，还会提起当年。

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我就跟着了魔似的，怎么不规矩怎么来。我家邻居的孩子们都不上学，我爸为了让我们有个好的学习环境，把家搬到了清静一点的监狱旁边。但搬家后我开始频繁逃学，还拉上弟弟妹妹一起——当然，一定得把他们“完好无损”地带回家。不消说，挨我妈一顿打是必然的，但下次照旧。欺负我弟也是常事，我三弟到现在都说：“哥，你小时候就知道揍我。”那时候，我还偷过邻居家的狗，偷过部队里的小猪。相信每一个调皮捣蛋过的人回想过去，都有几段哭笑不得的趣事。

我四年级的时候，家里经济条件变好了，还搬到了住了很多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巷子里。不过，我奔放而淘气的性格还是没改。比如，人家放风筝都在地上放，而我得在屋顶上放，有一次风筝飞了，我跟着从屋顶上“飞”下来。五年级时我开始学会骂人了，看谁不顺眼都讥讽几句，包括邻居家读汉语学校的小女孩。她哭着跑回家，没一会儿，她姐姐就跑出来臭骂了我一顿。我只记得她特别凶，然后就彻底喜欢上这姑娘了，她成了我的初恋。

离家出走也是常事。有一次我干脆跑到了阿图什的奶奶家。那时我 10 岁，跟我妈斗气，跑到一个亲戚家里，撒谎说我妈病了，需要钱，他便给了我 100 块钱。我跑到汽车站想买票，售票员不卖给小孩儿，我就对旁边一个大哥说：“我要去阿图什看奶奶，能不能帮我买张去喀什的票？”他说行，然后以我哥哥的身份带我上了车。到了喀什的莎车县，他硬拉着我下车，我哭喊着说我不认识这个人。车上的人纷纷质问那男的，但他一口咬定我是他弟弟。后来，是一个抱孩子的阿姨硬把我从那个人手里抢了过来，不然我可能就被拐卖到内地做小偷了。那个阿姨很热心，把我带到她家吃饭、住下，交代她弟弟第二天送我去阿图什。到了奶奶家，奶奶赶紧让叔叔们给和田的家里发个电报报平安。说真的，我做了很多很混蛋的事情，但我妈一直都觉得我是好孩子、是有良心的人，只是我一直都不知道到底该如何和他人相处。

之后我进入和田县一中读初中。刚上了两个月就很不喜欢这个学校，于是我自己跑到二中，找了个老师说我想转来这里上学。当时学校管理没有现在这么复杂，我很容易就得到了许可，便转学了。

那时我家的经济条件也越来越好，爸爸经常坐飞机去内地谈生意，每次回来都给我带飞机上送的领带，于是我当时的“标配行头”就是西装仔裤配领带。在夏天，那一身行头有多热只有我自己知道，但为了有型，我也强忍着。

当然，我也怂过，被一个“大胖”欺负过。为了打败他，我每天练习长跑，学拳击。记得是我入团那天——要知道我写了好多申请书，可算轮到我了——我和朋友闹着玩儿，一巴掌误打到了“大胖”，我已经说了对不起，但他的拳头还是过来了。我那时已经练了很久的拳击，第一回合他就被我打趴下了。下午入团仪式开始，台上的老师刚念到“初二二班库尔班江……”，那孩子就又过来跟我打架，我再次把他打趴下后才上台完成入团仪式——和“退团仪式”。等回到班里，我们又打了第三场，还是我赢了。第二天他鼻青脸肿地来上课，以后再不敢欺负我了。不打不相识，我和“大胖”后来成了朋友。从那之后，我的拳击越来越有模有样，还被请去体委教课。

初中的时候我学习成绩很好，但改不了坏脾气，在学校和同学打架，和老师、校长掐架，在家里也经常对母亲甩脸色。也正因如此，1998 年冬天，初恋女友和我分手了，她说接受不了我如此对待父母，这也给了我不小的打击。



和田的维吾尔族人家都很传统，但我们家很“开放”。我父母都是普通的农民，我爸 14 岁就离开家做生意，频繁去往内地，眼界很开阔，很包容。父亲常年在外，生活的重担落在了母亲身上，她为以我为首的四个调皮捣蛋的孩子操了很多心。爸爸每次临走都留下很多钱给我们，但毕竟他回来的时间没个准儿。有一次爸爸离开家一年多，为了我的学费，妈妈就推着车子在街上卖水果。那是冬天，她就穿着一件皮衣，抱着我三弟在街边，还不让我帮忙，要我好好上学。我们家几个孩子都没去过讲经班，为此妈妈的兄妹至今都不跟她来往，偶尔见面还刺激她：“你跟你们家孩子说话需要翻译吧？”言下之意是说我们不会说母语，是异教徒——实际上我们维吾尔语都很好。

膝下的孝，心里的爱

1998 年我考上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师范学校汉语专业的中专班。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家，第一次出和田。我爸送我，一路上他对路过的地方了如指掌，让我特别佩服，我也想以后和他一样去很多地方。他问我：“儿子，你上学为了什么？”我说为了工作赚钱。我爸说：“那你不要上了，上学是为了学知识，为了更好地理解生活，如果为了赚钱，还不如不学。”我父亲总说他没读过书，所以吃了很多苦，因此哪怕卖掉裤子也要供我们上学。那次之后，我突然觉得自己确实该学点什么了。

中专第一学期结束，我回到家，在家门口看到我妈，我就跪下了，跪着爬到我妈跟前向她道歉，说自己过去不懂事，没有照顾好她，没有孝顺好她。倒不是因为我上学受了什么委屈，而是因为那是我第一次离开母亲无微不至的照顾，第一次明白家和家人对我原来那么重要。我还买了花，找到所有被我欺负过的老师——道歉。原本刚去师范学校时，我死活不想当老师，但此时我觉得老师是一个特别伟大的职业，也想做老师了。

在和田那个环境里没法学汉语，初中时我也只认得“我、你、他、爱”这几个字，这还是因为想跟女朋友表达爱意而专门学会的。所以刚上中专时，我提出要和汉族同学住，以便提高我的汉语水平，可学校担心混住产生矛盾，没有同意。后来我参加了博州的散打比赛，拿了第一，学校特别重视我，我就借机耍赖，再次要求和汉族同学住，不然就转学，这次终于成功了。舍友都是好哥们儿，大家都特热心地教我汉语，还教我给初恋女友用汉语写信。我这些积极的转变，终于让我重新把她追回来了。

那时，我爸的生意也达到鼎盛时期，我家的生活也过得很滋润。中专的时候我就有了随身听，1999 年就用上了手机。也是那年生日，我攒下 3000 块想买把吉他，然而在路过一家店的橱窗时，我和一台凤凰 d2000 “一见钟情”，于是毫不犹豫地抛弃了吉他，带回了相机。后来我在学校提供有偿拍照服务，一学期就把相机的钱赚回来了。那段时间也给我的摄影技术打下了基础，纯靠自学了解了光圈、速度，还有景深。2000 年 4 月，我自费在学校办了“和田巴扎摄影展”，那也是我的第一个摄影展。

在父亲的踪影里寻找自己

我家的生活越来越好，但似乎真主注定要给我家一条曲折的道路。我爸去俄罗斯做生意，被抢了 200 万，一下子什么都没有了。我印象特别深，爸爸从俄罗斯回来时是半夜，他扛着一个破麻袋，笑着走进门。我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看到爸爸回来都很高兴。我爸笑着说：“真主给的，真主又拿走了。”没过多久，爸爸就去了内地。后来我才知道，他那一次带走了家里几乎全部的玉石，想把损失赚回来，没想到后来又全被偷了，这对他是沉重的打击。他责任感很强，觉得赚不到钱就不能回家，但越较劲就越没起色，最后承受不了打击，失踪了，四年音信全无。



那时我快要毕业了，我的同学中有的去了和田本地的小学当代课老师，有的在家待业。我依旧一腔热血想要投身教育事业，但在一所学校的实习经历让我的热情没了。事情的起因是我发现一个女老师经常辱骂学生，而且话非常难听，于是我跟她说，农村孩子没有汉语环境，汉语也不好学，辱骂不是教育的方式。然而她趾高气扬地说我是个实习生，没有资格教育她。这句话使得我和她的沟通升级为争吵，互相都说了些难听的话。她跑去跟校长告状，校长不由分说地臭骂我，难听程度更甚，我于是说：“上梁不正下梁歪，有你这种校长，老师也好不到哪儿去。”这句话使得办公室成了武场。我被抓到派出所蹲了一天，实习成绩也为零。

回到学校，我跟班主任说了事情的经过，他开导了我，让我不要因此对新疆的教育事业失望，希望我不要放弃当老师的理想。毕业的时候我还被评为优秀实习生。但在那时，父亲失踪了。祸不单行，我打拳击时伤到了左眼，玻璃体出血，为了做手术，我妈借了一万多块钱。多重打击之下，我家的经济彻底崩溃了。

妹妹在乌鲁木齐上大学，老三要高考，老四在上初中。作为家里的长子，我必须撑起这个家。于是，养好伤之后我就出去挣钱了。

我跑到一所学校门口，见着学生就问要不要拍照，两块钱一张。最初两天根本不好意思开口，曾经的学校霸王现在到门口求人，面子往哪儿放？第三天，我豁出去了。那一天因为下大雪，拍照片的学生出奇得多，排着长队等着我拍，一天内就拍掉了12卷胶卷。我在那儿拍了差不多40天，赚了2180块钱，自己留了50，剩下的全寄给了家里。

那段时间压力太大了，每一天都必须挣到钱。第一年我赚了两万八，给家里花掉了两万六。古尔邦节我自己节衣缩食，给弟弟妹妹添置新衣物，因为我不想让他们感觉到父亲不在生活水准就降低了。

为了挣钱，我也尝试到乌鲁木齐做生意。可由于经验不足，最终“挣”到兜里一分钱都没有了。其实我妈家的亲戚都在乌鲁木齐，我完全可以投奔过去，但我就是个拧脾气，不愿意低头去找任何人帮忙。于是，我每天去天池路附近转悠，那边和田人多，我也想做点和田玉生意，但无从下手，不会！晚上没地方住，又不想让别人看到赛买提的儿子在睡大街，就漫无目的地走了三个小时，最后睡在公园。最后我找了家餐馆，问老板能不能在这儿帮忙，洗碗、卖烤肉都成，有饭吃有地儿住就行。老板叫马哥，什么都没问就收了我。我在那儿卖烤肉，11天后他突然非常诚恳地跟我说：“小伙子，你不适合做这个，回家吧。”他给我买了大巴车票，还塞给我1100块钱，我就回家了。

我在乌鲁木齐发现了“话吧”，感觉挺挣钱的。2002年我便在和田开了第一家话吧，900块投资，四个月营业额达到一万多，两万二转让。不仅保证了一家人的生活所需，也还清了家里欠的债。有了钱，我就开始做和田玉生意，从和田做到乌鲁木齐，那也是我作为一个生意人走向辉煌的时候。我给人做代销，最“疯狂”的时候，曾经一天代销了70多万，纯利润就30多万。香港电影里有不少黑帮老大，背后跟着很多小弟，边走边散钱——我当时在乌鲁木齐就混到了那个地步。不过，钱也让我接触到了鱼龙混杂的社会，聚众打架是家常便饭，我甚至开始赌博。当时我和合伙人合资买了个房子，几百万的货就放在那儿，有一天我回到那里，看到两个姑娘就在我眼前注射毒品……我吓傻了，浑身都是冷汗。等她们走了，我跟合伙人说：“咱们是做干净生意的，真主让我们赚了不少，也会让我们赚得更多，家里几百万的货，丢了怎么办？不要再接触这样的人了。”可他来了句：“你管得着我吗？我就是为了躲父母才跑到乌鲁木齐的，你是我父母吗？”愤怒之下，我揍了他，跟他说：“乌鲁木齐有你没我，有我没你。”他鼻青脸肿地表示死也不回和田。于是我当场分资产，留下房子、他的钱和石头给他，筷子都分得一清二楚，第二天我就打包回到了和田。直到2011年，我都没在乌鲁木齐停留过三天以上，就因为这次不好的回忆。

那时候我和初恋女友恋爱七八年了，经常去石河子看她。当然，摄影也没放下，我还在石河子大学办了摄影展。此外，我也在不断打听父亲的下落。

2003年，我去了内地继续做生意，更是为了打听父亲的下落。父亲曾告诉我，他在河南的古玩市场做过生意，我便把他的照片留给了河南几个大古玩市场的商贩，让他们看到这个人就给我打电话，定有重谢。最欣慰的是那两年我没有接到过假电话，接到的唯一一通电话就使我有了父亲的下落。2004年5月，我在河南郑州的一个小宾馆里找到了已经接近崩溃的父亲。

父亲那几年的故事我是听宾馆的老板说的，这里面有个让我很感慨的细节。十几年前，一个在河南郑州骑三轮拉活儿的当地人，在火车站拉了个新疆人，那个人就是我父亲。那是个冬天，父亲看他骑得特别辛苦，就给了50元，说不用找了。

2001年末，受了打击的父亲来到郑州，来到了一个旅馆，而在前台登记的老板就是那个骑三轮的师傅。他认出了我父亲，看到父亲的精神状态很不好，就给他开了房间，还送来清真饭菜，跟他说放心住，别说钱，就这样一直到了2004年。

父亲再次来到河南，也是希望能重新开始做生意，便去了几次当地的古玩市场，就这样被一个我留下照片的商贩认出来了。他问了我父亲的住处，还特地跟着父亲去了那个旅馆，确认之后才给我打了电话。我当时简直兴奋得无法形容，买了当天的票就赶过去了。

我至今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旅馆的老板和给我打电话的商贩，他们救了我父亲一命，救了我们家，但他们都死活不要我的钱。从那天起，我明白了，任何对地域的偏见和歧视都是错误的。

父亲不在的那几年里，我妈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别说邻居了，连亲戚都说闲话，说看到赛买提在内地找别的老婆生孩子了。她平时是挺坚强的一个女人，但听到流言蜚语也会在家哭。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好听的话我也不会说，只说：“我爸不管娶老婆还是有孩子，只要活着就比什么都强，如果你想改嫁，我明天就给你安排，我养你。”我妈骂我神经病。最欣慰的还是弟弟妹妹，那四年他们把我当爸爸一样，直到现在都非常尊重和理解我，从来不埋怨我离家在外。他们陪我走过人生低谷，更是我迷茫时的前进方向。

我把父亲带回家，把这几年我做生意赚的钱全部转交给了他，希望能帮他重新回归正轨。之后的半年，父亲在家休息，我继续做生意，却也继续沉迷于赌博，短短半年，我搭进去50多万。我妈好像有所察觉了，认真地跟我说：“孩子，赌博这东西有输有赢，真正的赌博没有赢家。”她没指责我，也没硬要拦住我，但我知道，我遇到问题了，我必须走出来，必须找到一根救命稻草，否则就完了。这时候，孟晓程，也就是我干爹出现了。

干爹干娘

我是在2002年冬天做玉石生意的时候认识我干爹孟晓程的。他喜欢和田玉，也喜欢摄影，跟我很投缘。他每次来和田都送我胶卷，还有和田买不到的反转片，一箱一箱的，我也给他留最好的石头。就在我陷进赌博里迷茫的时候，孟晓程夫妇到和田来了，他们是塔里木电视台的，这次来拍纪录片，就问我要不要跟他们去拍纪录片做摄像。我一口答应了，因为我知道这就是我的救命稻草。我爸十分支持我，还叫我怎么对他就怎么对孟晓程，干爹就这么认了。就这样我离开了和田，跟着他们夫妇俩去了库尔勒拍胡杨林，这一待就是一年半。干爹干娘一个是摄像，一个是导演，他俩不光教了我很多技术，还教会了我很多做人的道理，最让我感动至今的还是他们给我的包容。

干爹这个人话不多，他就像父亲一样，不求任何回报地关心我的一切，包容我的所有。《森林之歌》拍完了，干爹回北京前问我有什么梦想或者目标，我说我想上大学。我爸再次尊重了我的选择。2006年8月23日，干爹带我来到北京，送我到中国传媒大学进修。就这样，我离开了那个刻下了我21年“混世魔王”历史的家乡和田，离开了新疆。我决心洗心革面，迎接我之后在北京，真正在内地的新生活。



在新疆那 20 多年，我就像井底之蛙，没人能让我审视我自己，只有我撞别人的份儿，没有别人碰我的机会。但从新疆出来后，我接触到了更广阔的世界，也被生活上的种种撞了一遍，每一天都有思维上的碰撞，边撞边学，边学边成长。如果没有那些酸甜苦辣，没有那些无私地帮助我、爱我的人，我今天也站不到这个位置，干不出这些成绩，做不了今天这个库尔班江·赛买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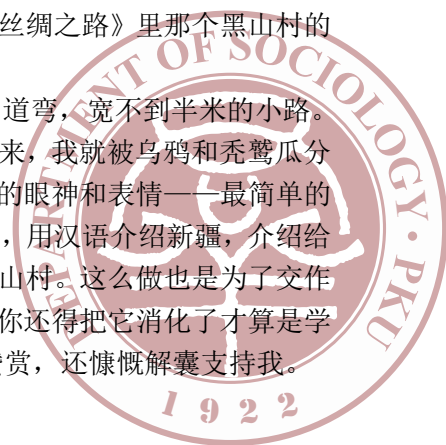
在跟干爹干娘去拍《森林之歌》时，碰撞就开始了。我那时候脾气还没收敛，看见不顺眼的还是爱嘲讽、耍脾气，拍摄的时候根本就是捣乱，跟信仰有关系的都不让拍。干爹干娘都让着我。同行的还有位唐学彦老师，虽然很看不惯我的言行，但还是一直用开导的方式教导我。但有一次，我对司机大哥一顿嘲讽，从来不骂人的唐老师终于忍不住臭骂了我一顿：“不懂事、不包容、没有胸怀、不懂得尊重别人、干不了大事儿……”。这事让我受到了很大的震动。2005 年 10 月 28 日，我爬到拍摄基地的宾馆楼顶，想跳楼自杀。我还买了包烟，那是我第一次抽烟，冒了几口，然后往下看，“脑补”了一些画面：从十层掉下去脸会朝上还是朝下？地上的钉子会不会扎进我脸上，死得不好看？想着想着就怕了，这时唐老师的训诫回荡在耳边，我幡然醒悟：自己一定要好好活着，出人头地，痛改前非。从那之后，我开始虚心接受任何人给我的批评、意见和建议，也慢慢学习如何改变自己。我一直觉得，是唐老师把我的心魔骂碎了。

态度的改变带来了质变。之后的拍摄过程中，“学”就是我的态度。我干起活儿来非常玩命，为了拍到更好看的画面，甚至做过一些很危险的事情。干爹干娘怕我出事，为此没少吼我，但他们看到了我好学的态度，也更加全心全意地教我。

自学成才，苦干成功

我本来可以在传媒大学远程教育学院拿到文凭，但到了大兴的校区，我发现那里没有我想要的大学氛围。于是我找到了毕根辉院长，跟他申请去学校本部听课，课余自学，放弃远程教育学院的学位。他没有立即否决我，而是说过去有过这样的学生，但因为自学和自控能力不强，学业也就荒废了。我向他保证自己没问题，他就帮我安排了没有学位的旁听生资格，还安排我和本科生住在一起，现在想想，一个老师的决定可能影响一个学生的一辈子，我对毕院长至今仍心存感激。从此，我对这个学校有了信任。在一个开放的学府，学籍问题没有成为我的障碍。那几年里我认识了很多朋友，一说“阿江”同学们就都知道是我，我和三个室友也成了好哥们儿，大家彼此都非常尊重。还有很多非常优秀的老师，他们的课我甚至追着听了好几遍，有的老师都烦我了，因为他们要说的每一句话，以及作为案例要放的片子我都门儿清。其实这是因为我汉语基础不好，必须听好几遍才能懂。我现在还留着当时的笔记，一共七八本，上面汉字、拼音、维吾尔语相互夹杂。我的思考角度和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以前在新疆，我离拍摄对象非常近，角度比较单一，所以大部分都是单张的风光人文大片。但在大学的这几年，我跳出来看新疆，才发现这是个巨大的画板，有那么多角度让我更好地理解新疆。我这才发现，自己想要的其实是用很多年沉淀的图片故事，去看待问题、变化还有发展。半年后我回到和田，去了喀拉古塔格，也就是黑山村。小时候我妈就总吓唬我说：“不好好读书就把你扔到黑山去！”初恋女友的父亲也跟我讲过很多他在黑山做医生时的见闻，让我觉得那地方很神秘。再加上纪录片《新丝绸之路》里那个黑山村的镜头，我便决定去那里看看。

20 个小时的车程，7 小时的步行，落差 1000 米，近乎垂直的 82 道弯，宽不到半米的小路。我险些掉下陡崖，要不是我死死拽着毛驴缰绳，带路人赶忙把我拉上来，我就会被乌鸦和秃鹫瓜分了。我在黑山村拍下了人们淳朴生活的影像，拍下了那些独特而纯净的眼神和表情——最简单的往往是最干净美好的。我明白我应该用更宽广的眼界和胸怀拍摄新疆，用汉语介绍新疆，介绍给更多的内地人。回到学校后，我办了黑山图片展，并招募志愿者去黑山村。这么做也是为了交作业，其他同学都由老师布置，我自己给自己布置。老师喂完你知识，你还得把它消化了才算是学会。我跟毕根辉院长和张雅欣老师一说这些想法和策划，他们非常赞赏，还慷慨解囊支持我。



2007年寒假，我带着海选出来的6个同学去了黑山村。虽然在家都是宝贝孩子，但他们一路上都没叫苦，还拍回了纪录片《喀拉古塔格日记》。我们在黑山村成立了传媒大学阳光书室，放满了我们购买的书籍和文具。回来后，我们在各大高校巡回举办新疆文化主题图片摄影展，并放映纪录片，拿了很多奖。看过纪录片和图片展的学生们又捐了更多的图书和文具。其实最开心的还是我的老师们，他们一直在支持和鼓励我，在策展办展的很多问题上给予我帮助，还帮我联系了平遥摄影展等活动。同学们也都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互相合作。这些让我从与别人在性格上碰撞，慢慢变成和别人在思维上交流，不断刺激我产生新的想法。是大学给了我发挥的舞台，我得到了认可，这让我为之自豪。

毕业的时候，干爹已经从纪录片行业退居二线，全心干起了玉石生意，而我改行做起了“电视民工”——我俩调了个个儿。干爹为了给我找新的师父，盯上了央视拍纪录片最牛的摄像王路。干爹没事儿就去找王路，有机会就提我名字。王路爱喝酒，为了让他收我为徒，干爹不会喝酒也硬陪他喝，喝到王路没脾气了，我这才进了师门。

陈晓卿是王路的师父，我顺理成章地叫他师爷。早在参与拍《森林之歌》的时候，陈晓卿就已经对我有了印象。在干爹干娘以及陈晓卿的帮助下，我在《见证》获得了摄像助理的职务，后来我又跟着他们拍了《好运北京》《岁月山河》《生者一年间》。

进入2009年，我的摄像事业停滞了，什么活儿都没有，“家里蹲”了一年，收入全靠干爹和自己倒玉的那点儿本事。清闲的状态让我急躁，连师父都打击我，说我放着和田玉的大钱不挣，非来干纪录片。当时我觉得纪录片是不是跟我缘尽了，甚至想到了放弃。直到那年年底《时·光》开拍，导演肖崑（本书封面我的肖像的拍摄者）、总摄像王路、总录音杜晓辉，还有我这个摄像助理四个人组成了一个团队，才又回到学习和工作的状态。从那时一直到现在，我都处于高速运转的工作模式，再没清闲过了。

《时·光》让我在摄影方面的思维有了彻底的转变。片中的主人公是20位摄影师，他们在中国纪实摄影领域有着杰出的贡献，同时对中国的社会变迁有着较深的理解和展现。一下子能和这么多大师面对面，这是何等的幸运！我和这20位摄影大师也成了很好的朋友。我是个行动力很强，甚至是过强的人，就像小时候想干啥就干啥，现在在工作上，也是想到一个点子、策划或者项目，就马上动手。在很多人看来，这有些不理智，我也确实因此经历了很多起伏，甚至会走向极端。但事实证明，行动会自动给思维纠错，而且我身边有这么多老师，他们对我毫无保留，总是提出特别好的建议和意见，他们是我人生道路上的灯塔。话说回来，“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老师指好路了，我一定要把油门踩到底，奋勇直前，做到最好，因为我不光代表自己，还代表了新疆人。

我刚来北京的时候很极端，容不得任何人说维吾尔族或新疆的不好，也因此对自己的言行举止都极度严苛。北京竞争那么激烈，能干的人多了去了，不缺拍纪录片的，如果我不比别人付出多倍的努力，肯定是要被淘汰的。我也有架上机器完全不知道该拍什么的时候，并且被导演打击说“你不适合拍纪录片”，是我师父王路一句特别“霸道”的话鼓励了我，让我振奋起来，他说：“我说你是个好摄像，你就是个好摄像！”虽然至今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个好摄像，但至少可以让导演满意了。

工作的时候，该我做的工作我一定会认真去做，不再觉得维吾尔族会有什么不同。但是做纪录片都是在外风餐露宿，吃饭有时候确实特别困难。在有的地方说维吾尔族、清真，都没人懂，就得说回民；还有的地方说回民也没人懂。在四川地震灾区，导演告诉店家，库尔班江要吃清真的，结果，给我上了一盘清蒸排骨，导演都急了。没办法，只好说库尔班江信佛教，要吃素。哦，懂了，给我上了泡菜和米饭。地震灾区老百姓那种淳朴、善良，让我特别有感触。一个老太太，拿出家里最好的腊肉、腊肠给我们吃。老太太一直盯着我，问我为什么不吃腊肉。导演一再解释，他是穆斯林，是回民。老太太说，这个是我们自己做的，是干净的啊。我吃饭很快，吃完就想走。

老太太说，我没看到你吃腊肠。我一看她家的狗来了，就说，好，我吃，然后拿筷子夹了一块。导演看老太太一直盯着我，就跟她说话转移注意力。我趁她不注意把腊肠丢给了狗。筷子还没放嘴里，我就说，好吃。导演都觉得，库尔班江能做到这一步，真不容易。我对这些没那么矫情，我认为，这是一种尊重，他们遇到这么大的灾难，还把自己家里最好的东西拿出来。他们不懂维吾尔族的风俗，再解释也没有用。我不会吃，但就是要夹一块，这是对她的尊重，就算是一个善意的谎言吧。

我甚至还拍过杀野猪的场景。我们就住在猪窝旁边，导演过意不去。我说，没什么，你们不也一样会看到我们杀羊、杀牛。杀野猪是用一口特别大的锅，水都溅到我衣服上了，但我喜欢这工作，没办法。第二天，总导演慰问我，听说你受委屈了。我说，没事，拍得挺好的。他说，没说拍得好不好的事儿，是说你受委屈了。我说，没有啊。其实我确实是有反应的，那个场面血淋淋的，恶心得我饭也吃不下去。我做的这些，很多人不理解，说我已经不是穆斯林了。

维·吾·尔——维系你和我之间的关系

策划筹备《丝路，重新开始的旅程》时，执行总导演李文举和导演李晓东，也就是我干娘，给我讲了很多维吾尔族和新疆的历史故事，包括伊斯兰教的故事。也就是在那时候我才第一次明白“维吾尔”三个字的来历：维指维系、维护，吾指“我”，尔指“你”，所以“维吾尔”是“维系你和我之间的关系”之意。2009年乌鲁木齐“7·5”暴力事件过后，我就开始策划以“维·吾·尔”为题的摄影展，酝酿了两年多，最后在2011年，“昆仑之墟·大美和田”摄影展办成了。第一次作为策展人，从整个展览的创意和策划到拉赞助，我都亲力亲为；同时作为参展摄影师，我还收集整理两位同样来自和田的摄影师的作品。因为一些无奈的状况，我还搭进去了很多钱，但是超过1.5万人次的观展人数和各大媒体的推广，让我感到很欣慰。记得有位大娘连着来了三天，还给我带了一盒拌面，说我辛苦了，令我非常感动。定居在北京，我和初恋女友在长达12年的恋爱后，最终还是分开了，因为他父亲觉得我们家是生意人，不愿意把女儿嫁给我，再加上我也把目标锁定在了北京，她不可能跟着一起去。记得有首歌叫《有一种爱叫作放手》，我就像歌里唱的那样，调整好心态，给她最好的祝福，就这么放手了。我学会了很多，也成熟了不少，现在知道彼此都有了相爱的另一半和幸福美满的家庭，这样就够了。我不敢说自己一直都是特别好的男人，但起码用心了，无愧于心。

后来，我很意外地和一个汉族女孩交往了一年多，我倒是没想过有什么不行的，看缘分嘛，我爸觉得我幸福就好。不过，因为性格和文化差异，这段关系也结束了，让我更意外的是，父亲说他松了口气——我的家人总是这样，无论他们觉得我是对是错，都陪着我碰撞。

结束这段关系没多久，我遇到了一个在北京长大的维吾尔族姑娘。那时候我正在筹备摄影展，她愿意帮我找资源，一来二往，我就被这女孩的傻劲儿给吸引住了，她像男孩一样的勇敢，就像一张白纸。但这女孩傻到对我没想法，还对我很排斥，我的表白被拒绝了！习惯了姑娘围着我转，这女孩的态度让我觉得她脑子不好使了。

那段时间父亲突发脑梗，父母都希望赶紧去麦加朝觐，而我是家里的老大，弟弟妹妹都结婚了，按照老思想：长子不结婚，父母去朝觐没有意义。多方压力之下，我又遇到了另一个好姑娘，没半年我们就把婚事办了。不过，这段婚姻特别短暂，我一直都觉得这是我自己的原因。我总是一个人打拼，虽然有过恋爱经验，但婚姻是另外一个课堂，那是两个家族的结合。结婚后，接二连三发生了太多意想不到的事情，有家庭之间的摩擦，也有两个人之间的矛盾，问题的关键还是我不够成熟，不会解决，只是逃避，最后甚至逃出了北京，逃进工作里。最终，我恢复了单身，让自己安静沉淀了几个月。我想弄明白问题到底出在哪儿，我到底需不需要婚姻，我是不是该一个人……



几个月后，我厘清了思绪，重新去找那个在北京长大的傻姑娘，一个月后我们开始交往，8个月后我们结婚了。我一直觉得我挺像个挖金子的人，但这次我觉得我挖到的是一块玉。我们结婚一年多了，婚姻对我来说依旧是正在学习的课堂，但我收获了一个学习伙伴、生活伴侣和最好的爱人，也让自己慢慢变成一个更好的男人、丈夫、一家之主。

走出来的新疆，走不出来的新疆人

从新疆走出来到内地，我遇到的所有人都很尊重我，都很友好。曾经相处了三四年的室友，来自青岛的技术宅男李一斌，我们相处得跟亲兄弟一样。然而，不理解、不包容的事情并没有消失。尤其是从2008年奥运会开始，到乌鲁木齐“7·5”暴力事件，再到后来的“切糕”事件，乃至现在各种暴力恐怖事件发生之后，媒体总是把“暴恐”的帽子扣在新疆这两个字上。个别恐怖分子的暴行，直接影响了包括我在内的所有在内地生活、工作的新疆人。

我无论去哪儿，都要说我是和田人、新疆人，无时无刻不在给人们介绍和田，想尽办法多办新疆主题的摄影展，甚至一有拍摄任务就带大家去和田，为此还争取到了《舌尖上的中国》里的和田麻糖和沙漠烤肉的部分，连师爷陈晓卿都服了我，说一有好事儿我就推荐和田。但为什么和田人觉得我不好，觉得我家人不好，这让我很伤心，问题到底出在哪儿？

有些事我也会和朋友们聊聊，大家都理解我的感受，甚至说：“库尔班江，如果是我遭遇到这些不公，我肯定做不到你这样，还拿相机宣传大美大爱……”。我悲观过，极端过，还想过老子走人，但我更想给后代创造一个平等友爱的社会环境。我相信这个社会还是会越来越好，不会越来越差。我想对得起我自己，对得起我父母，我做好我自己，为我自己做事，不为别的，剩下的留给世人评述。我要做的就是用最擅长的方式去表达，用影像记录，让图片诉说。

要完成这个目标，我觉得我的见识还是不够多，于是我去印度、土耳其、美国做背包客，去观察那些国家和社会最平实的一面。我看到了印度对宗教的虔诚，土耳其对信仰和文明的包容，美国对多元文化的开放，在这些国家，古文明得以保留，新文化更得到了发展。

我发现，最有力量的是人的形象和故事。于是，我开始策划拍摄和撰写《我从新疆来》。

选自《我从新疆来》的26篇自述

我的父亲母亲



照片人物：阿依木·艾则孜（91岁，维吾尔族）、阿孜古丽·艾则孜母女

在我的记忆中，我的父母总是十分忙碌，经常要熬夜加班，长大后我才明白，那是因为他们十分热爱自己的工作，把发展和建设新疆，传承维吾尔族民族历史和文化视为自己毕生的使命。

我的母亲阿依木·艾则孜于1923年5月22日在塔城出生，18岁时和我的父亲结婚。母亲曾经在新疆大学、新疆医学院、自治区文化厅等单位工作过，父亲也一直在自治区政府部门工作。两个人在工作期间都为新疆的发展建设不遗